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外国名著

“我青年时代就读过《联邦党人文集》”

□ 邓 涵

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在西雅图举办的欢迎晚宴上发表了重要演讲。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详细阐述了中国的发展走向和政策取向，并就如何在新起点上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行了系统阐述。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最后，指出他在青年时代就读过美国的《联邦党人文集》，高度肯定了对中美人文交流对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就加强中美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殷切期望。

《联邦党人文集》是美国建国初期三位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和詹姆斯·麦迪逊为劝导民众支持新的联邦宪法，在纽约报刊上发表的85封公开信汇编而成的一本知名政治学著作。该书详细阐释和说明了美国新宪法的基本架构和制度安排，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和确定提供了思想来源和原则基础。

《联邦党人文集》的写作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国情基础，其设计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发展道路亦有自身的局限。麦迪逊在参与写作该书时已准确预测到美国的政治制度将难以避免出现党争。实践证明，在此后200多年时间里美国的党争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管控，反而是愈演愈烈。近年来，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之间的政治极化日益严重，昔日《联邦党人文集》里主张“权力制衡”的政治理想已经越来越被异化为“否决政治”的恶性循环，不仅导致了美国社会的撕裂，更威胁到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访美过程中表示在青年时代就读过《联邦党人文集》，生动地体现了中国理解、尊重美国等他国优秀文明成果的优良传统。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文明之间的相互了解不是为了去寻找一致和统一，而是要去客观理解彼此之间的差异和不同。有差异与分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唯我独尊，对不同表现出傲慢与偏见，甚至排斥不同文化和文明。没有哪一种文明比另一种文明更优越。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需要去深入了解，进而在包容互鉴中找到文化和文明的契合点、共同点，增进理解、扩大共识，把矛盾点转化为合作点，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习近平总书记在访美期间提到《联邦党人文集》，在表明中国了解、尊重美国对自己国家政治制度和道路选择所作不懈探索的同时，也深刻阐明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经过长期的努力和实践探索，中国基于自身的国情和需要成功开创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人民广泛拥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国家治理效能。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感兴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客观看待当代中国价值观念。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美差异化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是两国人民基于各自不同的历史和国情作出的时代选择。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存在分歧在所难免。处理中美关系关键在于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建设性方式妥善管控分歧。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美国的过程中提到《联邦党人文集》，旨在引导中美两国加强对话、加深了解、

增进释疑、促进合作。

大国相处之道在于相互尊重。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中重点阐述了如何在新起点上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时代命题，强调中美两国关系发展要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坚定不移推进合作共赢、妥善有效管控分歧、广泛培植人民友谊，进而稳步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同属世界大国，两国关系极为重要。相互尊重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中美关系要健康发展，关键应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由于历史文化、发展阶段不同，中国梦、美国梦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梦想内涵不尽相同，实现的具体途径和方式也可能不完全一样。但条条大路通罗马，各国人民对梦想的追求，不论有什么异同，都是激励他们顽强奋斗的强大动力，也为中美合作和各国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社会面临许多共同难题。中美关系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时代之问、世纪之问，两国不仅应该而且也完全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共同回应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不断改善和发展的良好期待。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美双方应展现大格局、肩负大担当，坚持向前看、往前走，就彼此关心的有关问题进行坦诚、深入、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准确了解彼此的政策意图，尊重彼此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努力构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

申时行（1535—1614年），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字汝默，号瑶泉。他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三月殿试第一，以状元入仕；万历十一年（1583年）四月接任内阁首辅大学士，主持朝政，是明代为数不多的“状元首辅”；万历十九年（1591年）九月因“争国本”一事，被言官交章弹劾下台。

申时行一生著述颇丰，有31卷本和68卷本的《申文定公集》存世，分别馆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及日本京都大学等处。同时，由于申时行当时社会地位较高，影响较大，因此他的部分著述也得以单独刊行，广为流布，比如《赐闲堂集》《书经讲义会编》《召对录》《升储汇录》等。其中，12卷的《书经讲义会编》（以下简称《会编》）是对申时行为明神宗朱翊钧授课讲章的萃取，集中体现了他对儒家经典《尚书》的理解和阐释，也深刻反映出他参与中国传统社会治国理政的思想渊源和价值基础。

（一）

“恭俭好礼”的申时行与神宗的关系一直保持融洽，彼此感情也较万历一朝其他辅臣更为持久深厚。虽然他并非神宗的蒙师，但却是承担课程最多、侍读时间最长的师傅，在朝夕相对间，深得神宗的器重，故而被尊称为“元辅先生”。基于此，申时行对神宗的教育辅导倾注了大量心血，希望自己能够将神宗培养成一代明君。而在中国古代的帝王谱系中，“德治”无疑是明君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因此，“德治”成为贯穿《会编》全书的核心价值与根本旨趣。诚如该书开篇所指出的，尧帝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古代最早最具影响的圣君，“以其有盛德为本耳”。申时行还通过对《尚书》中“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点进行演绎，将君王之“德”比喻成承载天下的容器，四时变化、家庙庙堂、士农工商都应该“用德以怀之化之”。如此，天下方能太平，百姓得以安定，王朝也可江山永固、世代相传。

至于如何“德治”，申时行又进一步指出，为君者要从“修身”“知人”“安民”这三个方面着手，积极蓄养“君德”。所谓“修身”，就是要克制私欲、勤于理政。在《会编》中，申时行列举了大量案例教训，提醒神宗切勿因一己私欲导致四海纷乱，也不要因贻误国事而埋下祸患，克己复礼、敬天修身，积极追慕圣贤周公所倡导的“君子所，其无逸”的道德境界。所谓“知人”，是指作为最高统治

者，要“亲贤臣，远小人”，知人善任，将真正德才兼备、知行合一的优秀官员选拔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分职任事、各尽其责，皇帝则可“垂拱而天下大治”。反之，选拔任用之官员德不配位、力有不逮，则极有可能导致朝廷中枢决策运作的迟滞甚至失误。除了做好“修身”“知人”，还要实现“安民”。

（二）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确保广大农户的耕作时间成为维系政权统治稳定的关键要务，即所谓的“使民以时”。但贯穿历代王朝始终、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恰恰证明了统治阶级很难真正做到“使民以时”。因此，作为帝师的申时行高度重视民本思想，在《会编》和经筵讲章中反复提醒神宗，民心向背直接关系到王朝的兴衰沉浮，“民心似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不可不慎。而君王要想获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就应当视百姓的好恶为上天的好恶，再以此作为调整统治策略的依据，逐步实现君民之间“上下无间，人心之所在即天理之所在也”。

作为内阁首辅，申时行在现实中也敢于抗拒劝谏神宗任意压榨剥削小民的旨意，积极践行民本思想。比如，万历十四（1586年）五月，神宗假借筹办皇六妹婚礼之名，大量征调国库和民间的金银珠宝、珍贵香料，朝中大臣屡谏不从，申时行则通过内阁揭帖居中协调，反复陈情，得以免之。万历十六年（1588年），外派的中官在北部边关发现多处银矿，神宗大喜过望，急于开采。但申时行认为，边关气候恶劣，土地肥力匮乏，老百姓的生存已经很艰难了，一旦大规模开发银矿，必然进一步加剧人民的负担；如果银矿开发再引起关外部族的觊觎，更会引发边疆安全危机。最终，神宗采纳了申时行的劝谏。

（三）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始终占据统治地位。但王朝实际运行的内在逻辑是“外儒内法”“王霸杂用”。尤其是一些身负中兴使命的君臣，往往尊奉法家，强调“严刑峻法”“综核名实”。与之不同的是，申时行在辅佐神宗执政时更倾向于“明德慎刑”，始终强调治理国家还是要以德治为主，刑罚为辅。他在《会编》中表示，即便是确须施刑，仍应“合乎人情、宜乎世变”，严格遵照国家律法和具体情由，斟酌损

申时行著述《书经讲义会编》

□ 张鑫

益，慎重量刑；切不可主观臆断、任性尚气，更不能将律法刑罚视为贯彻个人权力意志的工具。一旦刑罚不当，致残者无法复原，致死者更不得复生，长此以往势必会积累民间的怨气，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进而引发政局动荡。

历史文化典籍



李大钊的恩师与滦州起义

□ 陈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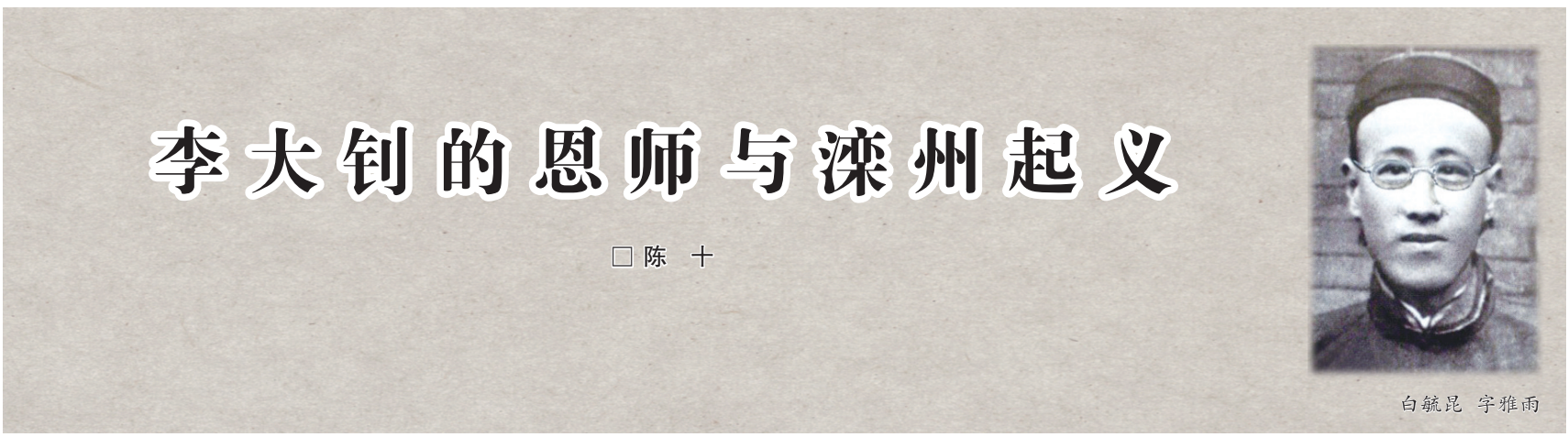
关于滦州起义，《滦县志（1986—2003）》里有一段这样的记载：“这里曾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震惊中外的辛亥滦州起义、张学良东北易帜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滦州大地。”滦州起义有一个重要的领导者，他就是李大钊的老师——白雅雨烈士。

1919年，李大钊再次在《五峰游记》中回想起恩师白雅雨：“到滦州车站……有一标在此起义，以众寡不敌失败，营长施从云、王金铭，参谋长白雅雨殉难，这是历史上的纪念地。”

李大钊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受到当时为学校史地教员的白雅雨的重要影响。白雅雨渊博的史地知识、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深深影响着年轻的李大钊。白雅雨的谆谆教导，使得李大钊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对李大钊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重要的影响。

1899年，白雅雨已经在地理学领域小有名气，受上海南洋公学和澄衷学堂邀请担任教习，在澄衷学堂，担任了二十世纪对中国影响巨大的思想家胡适的早期启蒙老师。现存胡适最早的日记《澄衷学堂日记》中，就记载了他在一次学生社团的集会上聆听白雅雨老师讲“泰否”二字之义一事。在此期间，白雅雨结识了蔡元培、张相文、钮永建等一批学术界大师，并与当时从事革命活动的章太炎、邹容、章士钊等人成了莫逆之交。在民主革命的影响下，白雅雨立志以“地理学救国”，成为当时最为著名的爱国学者。

清朝末年，中国内忧外患交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有志之士纷纷而起，上下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光绪



三十年（1904年），白雅雨参加蔡元培等建立的反清组织光复会，次年又随光复会并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积极从事有组织的反清革命活动。

1908年深秋，列强入侵，中国大地风雨飘摇，白雅雨应北洋女子师范、北洋法政学堂的邀请，携家眷来到天津，继续从事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到达津门后，他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感受到民众苍生的水深火热。白雅雨以振兴中华民族为己任，从团结和联系地学工作者入手，通过教育和提高民众的地理学知识以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上下奔走，特邀当时北洋女子学堂校长张相文等发起，于1909年9月27日（清宣统元年八月选举），创立了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地学会”，推举张相文为会长，而白雅雨担任了学会中最为重要的编辑部长，于1910年1月，主编并出版《地学杂志》，前18期都是由白雅雨为主编辑的，第一卷中载有《中国地学会启事》和《中国地学会简章》。启事通篇强调抗击帝国

主义的侵略，为了拯救中国，必须研究中国地理科学。后来的许多文章通过对祖国地理、山川、河流、矿藏的介绍，揭露了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罪行，并生动地通过边界线不平等条约的交涉事件绘制祖国固有的地图，揭露了帝国主义肢解、瓜分我国疆土的无耻行径。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激发了许许多多爱国志士的革命热情。

1910年底，天津爱国学生以北洋法政学堂为首，以间岛问题为由，罢课集会游行，要求清政府迅速召开国会，实行宪政。此时的白雅雨已经深刻认识了清廷的腐败和虚伪，他劝阻学生向清政府请愿，认为向清政府请愿是“与虎谋皮，无济于事”，已坚定了革命的信念。次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深受影响。白雅雨振臂高呼，京、津之地是“清室之根本”，他主张组织发动京、津起义，以彻底动摇“清室之根本”，达到推翻清政府反动统治的目的。他以组织红十字会天津分会的名义，聚众演说，宣

讲革命道理。红十字会天津分会作为革命外围组织，拟赴战区服务。11月，白雅雨在天津法租界的生昌酒楼与李大钊、凌铨等人组织建立了天津共和会，首批会员20多人，白雅雨担任会长，负责具体的领导工作。天津共和会成立后的革命目标主要是联络北京附近的革命团体进行武装暴动，最为重要的则是策动滦州的清朝新军起义，进而攻取北京、天津。此时的白雅雨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让妻子携带独子回江苏南通老家生活，临行前又将致沪军都督钮永建的密函缝入儿子内衣夹层内，一是吩咐后事，二是希望革命军能从海路北上，直取京师。

清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北方已是天寒地冻，但革命起义却进入了倒计时。白雅雨从天津出发，经坨子头，向敢死队长凌铨了解敌情，由凌铨等陪同，当晚拜会滦州警察所长张注东，并找到滦州知州朱佑葆。白雅雨当即宣布革命立场，做通朱佑葆的工作，计划在滦州宣布起义独立，以滦

州衙署为北方革命军政府，凡各税款交军政府以充军需。朱佑葆平日政声素好，深明大义，当即派员将盐务局滦州第三区征收局的账册和现款交给白雅雨。白雅雨等携款交由王金铭和施从云，双方商定了起义的细节。

白雅雨马不停蹄，迅速回到天津。北方革命协会在法租界召集各革命团体代表会议，白雅雨通报了滦州清军七十九标及革命党人准备起义情况即又孤身奔赴滦州。次日是1912年的元旦。这一天，滦州起义爆发，北方军政府成立，宣布独立。白雅雨代表同盟会授予王金铭大都督印，授予施从云总司令旗。白雅雨亲任参谋长，随后，策划西进，打算攻取天津和北京，完成革命大业。滦州起义的消息极大震动了京津。袁世凯急调三镇统制曹錕配合通永镇总兵王怀庆领兵赶往镇压。白雅雨见事不妙，指挥部下突围，约以到天津再谋大业，但不幸在古冶被敌军俘获。白雅雨大义凛然，坦然宣告：“我，滦州革命军参谋长白雅雨，何必刺刺不休！”面对

清兵，他大声疾呼：“同志们，共和大好，若是男子汉，应当为共和而战！”王怀庆急令立即处死，喝白雅雨下跪。白雅雨厉声斥骂：“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杀就杀吧，为何要加侮辱？”

白雅雨被害后，他的亲友和学生以天津红十字会的名义去开平收殮遗体，运回天津。烈士就义后，白雅雨生前执教的北洋法政学堂、北洋女子师范以及烈士的家乡江苏南通，先后举行了隆重的追悼活动。冯玉祥将军是滦州起义的初期参与者，在他的倡议下，为滦州起义的烈士在北京和山东泰山建造了纪念碑。

1912年9月，白雅雨烈士的灵柩安葬在家乡江苏南通狼山大观台东侧松柏环抱的山腰间。烈士之墓背靠青山，面对奔流不息的滚滚长江。墓碑上苍劲有力的“白雅雨烈士之墓”七个大字为清末状元张謇手书。墓碑旁的一块方方正正的石头上则刻着白雅雨烈士的绝命诗，虽历经百年，但字迹仍然清晰。狼山现已成为全国知名的风景区，游人如织，但每到此处，读到这首绝命诗，依然会令人动容：

慷慨赴死易 从容就义难
革命当流血 成功总在天
身同草木朽 魂随日月旋
耿耿此心志 仰望白云间
悠悠我心忧 苍天不经年
希望后起者 同志气相连
此身虽死了 千古美名传

